

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也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九十周年。對於中國現代史上這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海內外的作者有何全新的解讀呢？

——編者

自由主義與中國的經濟發展

顧昕的〈中國大轉型的自由主義之路〉（《二十一世紀》2010年10月號）一文，主要集中於政府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政府在中國經濟的極大發展中應當如何定位是該文的核心。

在顧昕看來，「中國模式」這種說法本身就值得懷疑。可以說，有中國經濟的發展而無所謂的「中國模式」之存在。中國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源於改革之前中國極權主義特性的權力有所鬆懈。這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人們的創造力和催生了市場經濟的出現和活力。但是，在經濟取得巨大發展的同時，中國也生發出了許多分利集團或權貴集團，它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副作用是無法迴避的。中國經濟下一步該如何發展，是一味繼續依賴仍具極權特徵的政府權力，還是主要依靠市場的活力？這是任何關注中國發展的人都需認真考慮的。

當然，我們提倡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不是說不要政府，按顧昕的觀點，我們所需要的政府是「市場友好型」而非「市場取代型」。只有政府的角色設定為支持而不是取代市場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經濟，才能真正促進經濟發展。

因而，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必須走自由主義的憲政道路。抨擊市場經濟的人通常指出市場失靈，但我們也必須清楚，政府也會失靈。與其迷戀政府，不如信任市場。而市場經濟體制要充分發揮其作用，必須有一個自由憲政的政治結構為前提或支撐，否則，這終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而這種體制下的經濟發展究竟能持續多久，我們抱有疑慮。

李海強 贛州

2010.10.25

「幸福」被「中國特色」了？

周永明的〈「幸福」在中國的不幸〉（《二十一世紀》2010年10月號）一文，探尋了中文詞「幸福」的來源。這篇文章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作者以後現代主義方式解讀了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如此熟稔的一個詞語，展現了其豐富的歷史內涵。在縱向的維度上，這個詞語用法與語意的變化實際上是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至今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變遷的一個反映。在激烈外部軍事競爭

下，這個詞被公共權威利用起來，對集體勾勒了一種理想的生活模式；在軍事競爭減弱、市場競爭主導的情況下，這個詞又轉變成個人競爭中可供比較的評判標準。然而，市場競爭往往是對傳統社會保護的一種傷害，在這個意義上，對「幸福」的重新政治化也是必然：如果一個政府希望秩序穩定，它必須要對這種社會傷害做出反應。因此，「幸福」看似無序的變化，實際上仍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

這個世界上也許並不存在一個客觀的、固定的、正確的「幸福」。要觀測這個詞對西方社會中群體和個人的含義，必須要同樣觀測它所處的特定政治、經濟和社會大環境。宗教和自然或許是中西環境差異的一個部分，卻並不是全部，它們與幸福程度之間也未必有着直接的因果聯繫。

總之，「幸福」進入中國後，就牢牢地跟隨着中國現實而展現出不同的內涵。在表面上看，這展現了中國的特殊性，但是深究一步，這種變化說的卻是與在西方社會一樣的普遍故事。

葉靜 北京

2010.10.10

抱殘守缺的「憂思」

許章潤的〈中國知識份子的文明憂思〉(《二十一世紀》2010年10月號)一文,用了「憂思」這個詞來反觀當下中國某些知識份子對於「民主」、「人權」的意見表達。當然,事實上這種「憂思」並非真的是一種憂患性的理性思考,而是處於「政治左派」的意識形態傾向下對普世價值的否認。但在普世價值已成氣候、意識形態必須走向多元化的當下,政治鬥爭被裝扮成了學術爭鳴,反對變成了「憂思」,意識形態發言人的身份也從「喉舌」搖身一變為頗為吃香的「知識份子」。既然是知識份子,知識份子所主張的「公共性」在哪裏?他們的底線又在何方?

誠如許章潤所言,無論左派政治還是普世價值,本身都不是靈丹妙藥。鄧小平推行的改革開放、胡錦濤主張的「以人為本」,以及近些年越南頗見成效的政治體制改革,便是左派執政者在普世價值中尋找解決實際問題的良方;而在經濟危機大潮席捲全球之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又紛紛拜倒在國家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大旗下,這便是普世價值的擁護不得不向左派政治靠攏的明證。

筆者進一步認為,知識份子的「文明憂思」與其說是「討巧賣乖」,毋寧說是「抱殘守缺」。因為當下全球各國的政治意識形態本質上早已不再是純粹的一元化,而是多元化觀念的夾雜。這既是執政者出於功利考慮,亦是受文化多元化大格局影響、制約的結果。而某些「知識份子」們不倫不類的「文明憂思」非但起不到「討好賣

乖」的作用,甚至還會受到來自於執政當局的無視或嘲笑。

韓晗 黃石

2010.10.12

跳出中國百年發展輪迴

按照張鳴在〈中國發展的百年輪迴?〉(《二十一世紀》2010年10月號)的思路,「中國發展的百年輪迴」的含義或許是指:在二十世紀的歷史和二十一世紀的現實之間,中國發展面臨着相同的抉擇,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在中國發展問題上,圍繞學習西方求生存謀發展,在西方世界的列車上,到底選擇走到哪一站?這是選擇「潘多拉盒子」打開和關上的問題,是選擇列車的「幸福終點站」的問題。

標題「中國發展的百年輪迴」後面打上一個問號,表明作者是以一種質疑的語態來表明中國發展要跳出輪迴,歷史和現實的「輕」和「重」在此勾連,這是文章的重點所在。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歷史和現實之間,本質的不同在於二十世紀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與二十世紀庚子年的那些官民不同,作為所謂「中國崛起」最大獲益者的中國共產黨,在經濟上所謂「中國模式」和文化上的儒家文化等方面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外衣掩蓋下,不是要從西方世界的列車上下來,而是要繼續搭乘這趟華麗的列車,並要避免列車裏的其他人干預自己的為所欲為。

中國共產黨這些維護自身既得利益的安全免疫舉措,無法使其到達「幸福終點站」,這緣於黨內卡里斯瑪權威弱化導

致的不同利益集團分立、腐敗等內因、績效型合法性難以持久等引發的國家治理危機。對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選擇民主是跳出中國百年發展輪迴的希望所在。

孫培軍 上海

2010.10.22

何為「中性政府」?

姚洋在其〈威權政府還是中性政府?〉(《二十一世紀》2010年10月號)一文中,用了一個新名詞來形容當今的中國政府——「中性政府」。所謂「中性政府」,姚洋認為是「不長期偏向某個(些)社會群體的政府」。姚洋還專門對“disinterestedness”一詞的三層含義作了解釋,並指出,「中性政府」一詞中的「中性」主要指的是其第二層含義,即「在觀察事物的時候不帶入個人感情」。姚洋進一步解釋說:中性政府「在制訂政策的時候也不是不摻雜自己的利益訴求,中性政府也是自利的,也可能對社會群體採取掠奪性行為」。

我們先不說一個政府在觀察事物的時候能不能「不帶入個人感情」,如果一個政府在制訂國家的大政方針的時候摻雜了自己的利益訴求,並且還可以堂而皇之地為自己的利益考慮,那麼這樣的政府如何守護其「中性」的原則?又怎麼能保證它不會為了自身的利益追求而偏向某些社會群體?

李穎麗 長春

2010.10.18